

明治时期作品中的“墓地”书写

符倩倪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er.v8i9.6397

[摘要] 明治时期有许多作家笔下的作品带有死亡意向，而同时能够表明“生与死之界”具象化的“墓地”成为文本中一个重要的符号。该研究旨在通过细读分析文本中涉及“墓地”的描写，从明治时期部分名家作品中探讨日本民族生死观和国家特性。

[关键词] 明治时期；墓地；生死观；日本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Cemetery" writing in Meiji period works

Qiancai Fu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many writers wrote works with the intention of deat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emetery" that can show the "boundary between life and deat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in the tex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depictions of "cemeteries" in the texts, and to explore the Japanes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works of some famous artists in the Meiji period.

Keywords: Meiji period; Cemetery;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Japan

引言

日本在迈入明治时期后，从内而外接受西方思潮的浸染，强调自由、独立、个性，在与日本传统观念冲突之下，诞生了许多书写风格独树一帜的作家，如在孤独与疯狂边缘窥探死亡的夏目漱石、以美贯通幽冥与人间的泉镜花、于自然中照见生命无常的国木田独步等。三位作家的作品中均出现过“墓地”的描写，虽所表现的意象些许不同，但从中能窥见的日本民族生死观及国家定位是一致的。

首先是中方的研究。刘利华在《日本历史认识的民族心理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8）中指出，日本民族的生死观即是认为活人等于死人，无论善恶之人死后都能前往彼世；先行研究对日本民族生死观的研究已经较为透彻。文章以文学作品中“墓地”符号入手，作品限定在明治时期，从新角度探寻日本人的生死观。

其次是日方的研究。曹起虎在《明治期的葬送墓制における特徴の諸相》（《比較民俗研究》2009）中提出，明治时期的“坟墓”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西方丧葬方式的影响动摇了日本人的祖先观的观点。虽然日本研究界对明治时期的墓地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还没有从日本民族的生死观和国家特点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中的墓地细节进行研究，因此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1 民族观念之墓：死亡并非终止的生死观

1.1 明治时期葬送墓制的转变

墓地是历史的纪念册，葬送墓制的改变，反映出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死亡认知的转变。对于日本墓地的历史来说，明治时期是重大转折点。明治政府在葬送墓制上推行了许多政策：首先，试行“神葬祭”，在推行过程中虽然出现了政策不充分、普及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寺院僧侣的特权，对神道宣传起了显著的作用，同时，这使得普通市民也能葬在墓地中。其次，禁止“火葬”和私葬，但导致了墓地不足的问题，遂解禁火葬。同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日本兼收并蓄了西欧部分墓地政策，通过将墓地搬迁至市中心外，设置“共葬墓地”“公园墓地”等方式以减轻墓地不足的压力^[1]。在此之下，明治时期还有一种新观念盛行——“自由葬”，如将骨灰撒入大自然的海葬、山葬等，冲击着日本传统家族观。

1.2 墓地在文本中的意象

墓地不仅象征着人物生命的终结，还提供了较强的叙事空间。在夏目漱石的《心》中，“我”与先生在杂司谷墓地相遇，先生触景生情，展开了关于生与死的话题，也由此埋下k之死的伏笔。经考究，文中的“杂司谷”墓地现存于东京都丰岛区，夏目漱石本人及泉镜花就安眠于此。明治5年，杂司谷被指定为神葬祭墓地之一，作为“共同墓地”供没有墓所的市民使用。文中，自k安葬在杂司谷后，先生也搬到了附近，每月一次独自前来祭拜。对于已经失去家的k来说，东京就是他的精神故乡，生命的最终归宿，同时墓地也是先

生的赎罪场。此处墓地代表的不仅是生命的终结，甚至是悲剧的延续。此外，文中的杂司谷墓地还葬有外国人，这种日本人和外国人合葬在同一空间领域下的景象，代表着明治维新现代与传统冲突之下日本的具象化^[2]。

在泉镜花的《外科室》中，贵族小姐迫于父母之命嫁给自己不爱之人，在学生时期还是医科学生的高峰与小姐一见钟情，再次见面则是在充满血色的手术台，已经成为伯爵夫人的她在手术中紧紧握着高峰的手，二人相认，夫人幸福地死去，他们两人是在同一天先后去世的，只不过分别埋葬在青山的墓地和谷中的墓地而已。

伯爵夫人与高峰分别葬在不同墓地。伯爵夫人所葬之处系青山灵园，是东京内最高级的墓所，从明治5年就被设定为公营墓地、神葬祭墓地，葬有明治维新元勋大久保利通、为天皇殉死的乃木希典等名人。而医生高峰所葬之处系谷中灵园，明治时期位于下谷区（现台东区），附近多数为寺庙^[3]。墓地在此处，其选址是绝对阶级的表现，也指向只有死亡有情人才共存的“他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同时泉镜花指出，有情人殉死并非罪恶，罪恶的是畸形的社会，压抑着人们的本性、对自我及美好爱情的追求，文中的伯爵夫人和高峰通过死亡反抗命运，看似获胜，实际从二人葬在身份有别的墓所中可看出，社会的禁锢远没有结束。

在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中，墓地是生活与自然密切结合的幸福之所：这条路也许就会把你引导到一个小树林里去。如果这条路到了林中又分成两条，那你就试挑其中较小的一条走吧，它也许会把你领到一个奇妙的去处。可能那是树林深处的一块古老的坟地，一排四五个满是青苔的坟墓，前面还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两旁尽是缙草花之类的野花。要是头顶上树梢头还有小鸟在歌唱，那更是你的幸福了^[4]。

作者在此处向读者推荐在武藏野散步，不用担心迷路，因为任何道路都有值得看、值得听、值得感动的地方，墓地也和原野、田地、山峦、池塘同样，是生活与自然密切结合的幸福之所，平凡普通却有滋味。国木田独步的文字恬静又充满自然的生机，在他的笔下，墓地并不含有悲剧色彩，而是自然和谐韵律下诞生的美景。而死亡对于人类只不过是回到了地球的怀抱之中，自然代替着人类继续生命的旅程。

以上三部作品虽表达的意象、揭露的社会本质、对墓地选址的考量等方面些许不同，但都暗含日本民族生死观的重要信号——死亡并非终止，死是生的延续^[5]。

1.3 民族生死观

在《心》中，先生的住所与杂司谷墓地距离并不遥远，而附近便是闹市及住宅区。《外科室》中提及的青山墓地及谷中墓地，《武藏野》中武藏野附近的墓地也同样。甚至在大正12年（1923年）开设了日本第一座公园墓地，

即多摩灵园。上述几处墓地在现如今的东京已经成为赏花、散步、拜访名家之墓的旅游景点，许多站台也以墓地命名。在墓地附近建造的低价公寓也会成为热销卖点。东京的日本人就那么过着开窗即见墓地，与墓地共生共存的生活。对此我们无法看到具体的书本对这种现象进行描写，墓地这个空间已经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之中^[6]。

其中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从古至今日本人保留着“人死成神”的信仰，并认为人死去后化作灵魂，参与着生者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光人不分善恶贵贱，一草一木也可成神成佛，在之后逐渐形成了“万物有灵论”。

由此，“死是生的延续”这一观念早已根植于日本人民族生死观中，而墓地成为了人类的“第二家园”，它不仅提供了死者肉体死亡后可以存放的外空间，更提供了与生者进行精神交流的内空间。

2 社会镜子之墓：包容多元的社会

《心》和《外科室》中，涉及墓地，我们不难去关注其中有别于传统日本的书写。其中的两个空间很坦率地展现了日本对外来文明的消化能力。

《心》中的墓地可以说得上是明治时期日本吸纳西洋文化后的微缩景观。先生和我从墓与墓之间穿行，准备上路。在依撒伯拉某某之墓和神仆罗金之墓的旁边，竖立着写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塔形墓标。还有的写着全权公使某某。在雕有安德烈字样的一座不大的墓前，我问先生该怎么念。先生苦笑道：“大概该念作 AN·Do·Re 吧！”

在这里，“依撒伯拉”的英文字母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汉字共享同一片土地。这种安排绝非偶然，而是明治日本文化空间的体现。同时，先生对这些“外来”墓碑的态度十分平静，当刚从家乡到东京的“我”还在为墓碑样式的差异感到新奇时，知识分子已经将这种文化混杂视为现代日本的自然状态。墓地作为逝去人们永恒的居所，其规划方式暗示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态度：明治日本正在将各种西洋文明“安葬”在自己的精神土壤中，让它们成为这个国家永恒记忆的一部分^[7]。

而在泉镜花的《外科室》里，医院走廊成为另一个文化包容性的剧场。从门厅通到外科室，从外科室通到二楼病房的长长的走廊里，还穿梭着身着大礼服的绅士，制服笔挺的武官，穿日本式礼装的人物，以及贵族小姐等等，个个雍容华贵，不同寻常，或擦身而过，或凑在一起，或走或停。

西装革履的绅士与穿着传统礼装的日本人并肩而行，这个画面比任何理论阐述都更生动地展现了明治时期的文化融合。在手术室这个现代医学的圣殿，成为了检验文化包容性的极限空间，传统与现代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同面对生死考验的伙伴。伯爵夫人的墓碑与外科手术的器械形成意味

深长的对照，暗示着日本贵族阶层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转型^[8]。

这两个空间共同揭示了明治日本包容性的重要特征：它不是简单的文化混合，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明选择。墓地中的墓碑排列和医院里的人群构成，都显示出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制度性接纳。这种包容性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就像先生能够准确读出“安德烈”的发音却选择保持其外来性一样，明治日本知道如何让异质元素既融入本土文化又保持其独特性。这个国家通过将外来文明“安葬”在墓地与“解剖”在医院，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独特诠释。

3 国家缩影之墓：空心的国家

明治文学中，墓地所蕴含的深层内涵远比表面复杂。不管是作品中的墓地，例如《心》中的杂司谷墓地，《外科学》中的青山墓地和谷中墓地，《武藏野》中的武藏野陵，还是现在仍矗立在东京的多摩灵园、千鸟渊公墓。这些在中心城区广布墓地的空间格局，恰与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东京的中心是空洞”这一描述吻合。

东京中心区域的墓地分布呈现出日本独特的文化特征。与中、美等国通常将墓地安置在城市边缘的惯例不同，明治时期乃至如今的东京让陵园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这一空间布置创造出独属于日本的文化韵味，墓地成为了城市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心》中先生每月例行前往墓地的路线，《武藏野》中对墓地不经意的发现与欣赏，我们可以看出住宅区与墓地紧密相连，暗示着现代日本市民与这种“空心”结构的日常共生关系。同时墓地里的多元文化墓碑群，呈现出各种文化元素被妥善安置，但中心位置仍保持“空洞”的现象，形成一种不强调单一的包容性。

但罗兰·巴特所提到的这种空洞的中心不过也是一个概念，东京市民就靠着想象出来的事物以回环成圈的方式绕着空洞的中心循环往返。这种概念给予日本一个合适的空间进行文化的吸纳，使得各种文化因素能够和平共存。

当中、美将墓地边缘化时，明治时期日本却让陵园占据城中心，暗示着一种独特的路径。墓中的多元墓碑不是混乱的象征，而是精心设计的文化对话场所。如此，日本或许确实是一个“空心国家”，但它的能量往往来自这种空洞的概念，能够提供一个将来自不同地方的文明吸纳甚至被其占据

的空间。在明治时期为日本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巨大的适应力。

4 结论

明治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墓地”这一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即是生死观的具象化表达，也是明治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见证。《心》中，墓地成为生者与死者命运交织的场所，暗示生死无别，死是另一种生的延续；《外科学》中将爱情殉道者安葬于两个空间，富有浪漫色彩地赋予死亡超越生的意义；《武藏野》中，墓地完美融合进自然风光，此处人与一草一木并无差异，终将会进入自然的轮回。这些对墓地的描写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共同指向日本民族“死是生的延续”这一观念。

墓地作为社会的镜子，更折射出明治时期多种文化的碰撞。墓地被安置在东京市中心，成为城市肌理的一部分，形成罗兰·巴特所说的“空心”结构。这种空间绝非偶然，为吸纳不同文明提供了可“安葬的墓地”。墓地书写因而超越了为文学服务的意味，成为解析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符号。

【参考文献】

- [1]曹起虎.明治期の葬送墓制における特徴の諸相[J].比較民族研究,2009.
- [2]刘利华.日本历史认知的民族心理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8(2):57-60.
- [3]解传博.“空无”的意义：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56-64.
- [4]王奕红.泉镜花小说《外科学室》中的反讽时空建构[J].国外文学,2015,(03):147-153,160.
- [5]日 泉镜花 -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M].上海三联书店,2012.
- [6]夏目漱石,林少华.心[M].中国宇航出版社,2008.
- [7]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商务印书馆,1994.
- [8]张石.“中心空虚”的日本文化[J].读书,1992(10):37-43.

作者简介：

符倩偲（2004.09—），女，黎族，海南省海口市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